



齐齐哈尔 城镇化建设研究

苗雨君 陈红梅 著

HEUP 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

齐齐哈尔城镇化建设研究

苗雨君 陈红梅 著

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齐齐哈尔城镇化建设问题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产业集群及其在农村城镇化发展中的作用,齐齐哈尔城镇化水平评价指标,对齐齐哈尔城镇化的发展历史、现状与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提出齐齐哈尔城镇化发展对策,构建齐齐哈尔城镇化建设基本模式。全书分为六章:第1章为绪论;第2章为城镇化建设研究的相关理论;第3章为齐齐哈尔城镇化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第4章为齐齐哈尔城镇化水平评价指标分析;第5章为国内外城镇化发展实践与启示;第6章为齐齐哈尔城镇化发展对策及城镇化模式研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齐齐哈尔城镇化建设研究/苗雨君,陈红梅著.
—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13.6
ISBN 978-7-5661-0604-9

I. ①齐… II. ①苗…②陈… III. ①城市化-建设-研究-齐齐哈尔市 IV. ①F299.27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47597号

出版发行 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124号
邮政编码 150001
发行电话 0451-82519328
传 真 0451-8251969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肇东市一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10.75
字 数 199千字
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3.00元
<http://www.hrbeupress.com>
E-mail:heupress@hrbeu.edu.cn

前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进入新的世纪，中国的经济增长热点将是城市化。全面加快城镇化进程，主要是解决中国最大的国情“三农”问题，农村、农业、农民的出路在于城市化，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的重要组成部分。城镇化是由于工业化引起的，伴随着现代化发展过程而产生的一种在空间地域上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迁移过程。城镇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到社会各方面的因素，它不仅是现有城市管理制度的创新，也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宏观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现有管理体制下的利益群体的权益，对整个社会经济将产生深刻的影响。

城镇化水平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的主要标志，也是衡量国家和地区社会组织成熟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是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中必须经历的重要一环。从各国的实践看，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很多值得重视的教训；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过多、过快，超出了城市的承载能力、超出了经济发展的承受能力，不但阻碍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而且带来了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如何避免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弊端，就成为中国未来发展中的一个现实问题。

本书是齐齐哈尔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齐齐哈尔城镇化建设研究”（项目编号：Qsx2007A-05）的研究成果。本项目研究结合齐齐哈尔市城镇发展的现状，通过分析产业集群及其在农村城镇化发展中的作用，对齐齐哈尔城镇化的发展历史、现状与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提出齐齐哈尔城镇化发展对策，构建齐齐哈尔城镇化建设基本模式。建设地域优势明显、资源优势鲜明、辐射带动功能较强的旅游型、商贸型、交通枢纽型等小城镇模式，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在本书编写过程中恰逢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黑龙江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生态建设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2512376）开展研究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之时，将“黑龙江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生态建设问题研究”项目研究的“城镇化进程中生态建设问题”相关研究成果亦撰写到本书中，作为“黑龙江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生态建设问题研究”项目的阶段性成果。本书也是齐齐哈尔大学“嫩江流域历史文化研究基地”

的嫩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方向的研究成果。

全书分六章和附录部分，第1章，绪论；第2章，城镇化建设研究的相关理论；第3章，齐齐哈尔城镇化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第4章，齐齐哈尔城镇化水平评价指标分析；第5章，国内外城镇化发展实践与启示；第6章，齐齐哈尔城镇化发展对策及城镇化模式研究；附录为项目研究发表的论文。全书由苗雨君总体设计，并撰写第1章、第3章、第5章、第6章；陈红梅撰写第2章、第4章和附录部分。王维教授、邓琳教授、陈红梅副教授等为本书的撰写给予了支持以及为资料收集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们是我可敬可爱的挚友。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齐齐哈尔大学、齐齐哈尔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领导和同志们的大力支持，谨在此致以真诚的谢意。

限于作者水平，书中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苗雨君

2013年1月于齐齐哈尔

目 录

第1章 绪论	1
1.1 课题研究的背景	1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	2
1.3 研究问题的思路、内容和方法	12
1.4 研究问题的意义	14
本章小结	17
第2章 城镇化建设研究的相关理论	19
2.1 产业集群的生命周期理论	19
2.2 城镇化成长模式理论	21
2.3 城镇化动力因素的理论分析	24
2.4 城镇化发展模式理论	30
本章小结	35
第3章 齐齐哈尔城镇化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36
3.1 齐齐哈尔城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	36
3.2 齐齐哈尔城镇化发展现状	41
3.3 齐齐哈尔城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46
本章小结	58
第4章 齐齐哈尔城镇化水平评价指标分析	60
4.1 齐齐哈尔城镇化水平指标体系的量化标准	60
4.2 齐齐哈尔市城市现代化现代化进程的基本判断	64
本章小结	70
第5章 国内外城镇化发展实践与启示	71
5.1 国外城镇化发展实践与启示	71
5.2 国内城镇化发展实践及启示	79
本章小结	84

第6章 齐齐哈尔城镇化发展对策及城镇化模式研究	86
6.1 齐齐哈尔地区城镇化发展目标	86
6.2 齐齐哈尔地区城镇化发展对策	90
6.3 加快小城镇建设的保障措施	96
6.4 齐齐哈尔市城镇化模式研究	104
6.5 小城镇建设模式具体案例	111
本章小结	121
结束语	122
附录 已发表的学术论文	124
参考文献	161

第 1 章 绪 论

1.1 课题研究的背景

城镇化是由于工业化引起的,伴随着现代化发展过程而产生的一种在空间地域上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迁移过程,是农村经济向城市经济的转变过程。城镇化水平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的主要标志,也是衡量国家和地区社会组织成熟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和谐”顾名思义可以解释为“配合的适当,协调”,2006 年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对和谐社会的内涵作了权威的解释,强调要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是指全面系统的和谐,既强调人与人的和谐,又达到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既要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系统内部的和谐,又要形成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和谐,使之共同协调发展。因此,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但要关注城市的发展,农村的发展问题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实现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和谐发展,而推动农村发展的主要方式就是推行农村城镇化,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

城镇化已成为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焦点问题,加快城镇化有利于解决当前及今后相当长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如何深入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促进城镇化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一个亟待研究的理论课题。更为重要的是,在经济处于全面过剩的情况下,城镇化有利于创造经济的最大增长空间,避免“农村病”和“城市病”,保障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施城镇化战略,推进城镇化进程,是我国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实现现代化历史任务的目标和手段的统一。进入 21 世纪,我国城镇化将进入加速阶段,协调和管理好城镇化这一巨大的经济社会结构变革,是 21 世纪初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任务。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我国 13 亿人口,8 亿多人口在农村。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

解决的关键在农村经济的发展。而农村城镇化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加快城镇化进程是解决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重要手段。齐齐哈尔市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加快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步伐,是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也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要求。齐齐哈尔市工业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和枢纽,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依然是齐齐哈尔市发展的主要动力,最大限度地利用齐齐哈尔市老工业基地对城镇化发展的承载优势,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以城镇化促进工业化,两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共同拉动齐齐哈尔市经济驶入“十二五”时期的经济增长快车道。因此,结合齐齐哈尔城镇化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依据齐齐哈尔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的进程,提出齐齐哈尔城镇化发展的合理对策,对于齐齐哈尔产业结构转换和生产力布局调整,促进齐齐哈尔市城镇化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研究齐齐哈尔的城镇化发展现状、问题和对策,不仅对促进齐齐哈尔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它有助于丰富和发展城镇化理论,特别有助于丰富和发展我国如何通过产业集群带动城镇化发展的实践意义。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

在被人们称为城镇化世纪的20世纪,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初步完成了高度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的过程,发展中国家也在不断加速城镇化的步伐。国际经验证明,城镇化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动力,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进入21世纪后,城镇化也应是我国经济和社会持续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农村城镇化建设也是农村实现现代化的根本保证,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是农村向城市社区演变为城市社会的途径。

1.2.1 国外研究动态

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百年的发展已经实现城乡一体化,其城镇化程度已经基本完善。现在主要已经转变为如何更好地发挥城镇功能和提供社会保障的研究方向,其中包括对如何发挥城镇化减缓大城市人口压力、如何调节大城市的环境等方面。在社会保障方面,主要是如何提高城镇的医疗、保险、就业、社区服务等方面。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进入后现代化社会和城市化高级阶段,农业和工业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进一步加强,农业产业化和农工商综合企业迅速发展,农场经营管理趋

向集中化、资本化和企业化,农民收入提高和城乡居民社会地位的平等化,小城镇兴起与郊区城镇化发展。它们面临的问题是保护城市与乡村的居住环境的多样化,推进城乡融合、城乡优势互补的城乡一体化发展,发展现代高效农业。由于发达国家在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方面都走在我国前面,城乡差别已相对缩小,清新的空气、优美的景观、舒适的生活、各种技术进步带来的成果已使农村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城市人口外流,农村风景独好的现象已初露端倪。国外关于城镇化方面研究的相关理论包括二元结构理论、核心-边缘理论、增长极理论和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等,其中以二元结构理论和基于该理论框架的城乡二元架构分析最为盛行。

1. 二元结构理论

二元结构理论由刘易斯在1954年创立,后经拉尼斯、费景汉、乔根森、托达罗等发展。在其理论模型中,将发展中国家经济划分为农业和工业两个部门,同时将经济发展的过程归结为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即农业比重逐渐下降而工业比重上升的过程。该理论认为:只要先进的城市部门的工资高于不发达的农村部门的传统工资,农村部门(农业部门)劳动力就会不断地向城市部门(工业部门)转移,这一过程将一直延续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城市完全吸收,农村工资和城市工资趋向一致,城乡差别逐步消失为止。该理论较好地解释了当时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迁移与城市高失业率持续并存的现象(Micheal P. Todaro, 1969)。在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基础上,关于城镇化和城乡问题研究方面,形成了一种“城-乡”二元分析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城乡被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对立部门。在这种概念框架之下,乡村被等同于传统的农业部门,城市被等同于现代非农业部门;经济发展过程即是乡村劳动力通过城乡迁移转移至城市的过程。并且认为这一过程已为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所证明,因而也必然为发展中国家所重复,这显然是不符合发展中国家实际的。城镇化二元分析框架具有其自身的时代性,但它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首先,它忽视了乡村非农活动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忽视乡村地区本身转变为城市,即农村城镇化在城镇化过程中的作用;其次,城镇化和经济结构转变之间的关系并不如理论所设计的那样。因为非农化水平与城镇化水平之间并无一一对应的关系。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非农产业在乡村地区越来越普遍,乡村非农产业使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无须通过传统的城乡迁移即可在乡村地区就地实现。

2. 增长极理论 (Growth Pole Theory)

增长极理论最初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 (Francois Perroux) 提出,许多区域经济学

者将这种理论引入地理空间,用它来解释和预测区域经济的结构和布局。后来法国经济学家布代维尔(J. B. Boudeville)将增长极理论引入到区域经济理论中,之后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John Frishman)、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A. O. Hirschman)分别在不同程度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使区域增长极理论的发展成为了区域开发工作中的流行观点。佩鲁首先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地理空间的经济空间。他主张经济空间是以抽象的数字空间为基础,经济单位不是存在于地理上的某一区位,而是存在于产业间的数学关系中,表现为存在于经济元素之间的经济关系。其次,佩鲁认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技术进步与创新。创新集中于那些规模较大,增长速度较快,与其他部门的相互关联效应较强的产业中,具有这些特征的产业佩鲁称之为推进型产业。推进型产业与被推进型产业通过经济联系建立起非竞争性联合体,通过后向、前向连锁效应带动区域的发展,最终实现区域发展的均衡。这种推进型产业就起着增长极的作用,它对其他产业(或地区)具有推进作用。第三,增长极理论的核心是推进型企业对被推进型企业的支配效应。支配,是指一个企业和城市、地区、国家在所处环境中的地位和作用。法国的另一位经济学家布代维尔认为,经济空间是经济变量在地理空间之中或之上的运用,增长极在拥有推进型产业的复合体城镇中出现。因此,他定义:增长极是指在城市配置不断扩大的工业综合体,并在影响范围内引导经济活动的进一步发展。布代维尔主张,通过“最有效地规划配置增长极并通过其推进工业的机制”,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美国经济学家盖尔在研究了各种增长极观点后,指出影响发展的空间再组织过程是扩散-回流过程,如果扩散-回流过程导致的空间影响为绝对发展水平的正增长,即是扩散效应,否则是回流效应。

3. 城市化生态环境理论研究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带来了一系列城市生态环境问题,人类对城市生态环境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62年美国生态学家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引发了美国以至于全世界的环境保护事业。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带来了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城市化和生态环境的关系及其和谐发展成为学者们关注研究的焦点。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1972)、哥尔德·史密斯的《生存的蓝图》及威斯特的《危机中的城市》等书籍都对城市化过程中的生态危机作过大量的描述与预测,激起了人们系统研究城市生态系统的兴趣,对城市生态的研究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1972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UNESCO)制订了MAB研究计划,其中人类聚居地的综合生态研究被列为重点项

目,从此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研究在国际学术团体和非官方组织之间积极展开。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生态城市的内涵、特征、指标体系、发展思路、基本框架、具体目标及步骤等。进入20世纪80年代,城市生态环境的研究更是异军突起。1980年,第二届欧洲生态学术讨论会,以城市生态系统作为会议的中心议题,从理论、方法、实践、应用等方面进行探索。此后各类城市生态研究工作蓬勃发展,各种相关出版物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法兰克福、墨西哥城、多伦多、东京、香港等几十个城市先后从不同角度开展了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92年6月3日至14日,联合国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召开了人类环境与发展大会。这次会议认为环境问题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巨大挑战,并就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达成一致。其中人类居住区及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给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研究注入了新的血液,成为当代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研究的重要动向和热点。随着现代生态学的发展,现代生态学与城市研究的结合,要求建设生态城市。

20世纪90年代,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研究更加多元化。美国著名经济学家Grossman等,选取表征环境与经济的主要指标,进行数理分析与经验判别,然后进行侧面解释,从而判别经济发展中城市化对环境是否有影响,以及影响的重要程度。1995年,Grossman和Krueger用计量经济学方法以42个发达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揭示了随着城市经济水平的提高,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呈现倒“U”型的演变规律,即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设。其后,国外很多学者应用环境经济的规范分析方法进行了大量的类似研究。但由于在研究中所选取的表征指标和模型不同,他们得到的结论存在很大的差异。生态学家则是通过对物种和种群的研究来描述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影响。Patricia M Harveson等通过对美国佛罗里达凯鹿的研究,分析了城市化过程对区域动物种群多样性的消极影响。Michael L McKinney探讨了城市化对生物均质性的作用与影响,认为城市动物种群增多,而乡村动物种群减少。Ingolfhn等通过对德国Floras的乡村与城市地区动物种群均质性变化分析,在对比60个城市与乡村斑块种群特征后,认为城市化对动物种群的均质性有非常大的影响。L R S Zanette等人研究了巴西都市区黄蜂与蜜蜂生活习性的改变,探讨了由于城市化改变土地覆被而引起黄蜂与蜜蜂种群数量变化的驱动作用及机制。此外,Deosthali通过模型模拟分析了城市化对城市局部气候的影响,Deplazes等分析了城市化对城市野生生物的多重影响。

目前,全球城市人口比重已超过农村人口,发达国家已步入“后城镇化”时期,城市人口比重普遍在75%以上。在这样的形势下,欧美学者主要加强了对城镇化带

来的深层次社会经济及环境问题的研究,如社区与管理、就业与社会平等、住房与财产权、移民和种族融合、全球化与新城市政治等。Lember 等(2011)分析了城市竞争力与公共创新之间的关系,认为公众获得创新能力有助于增强城市竞争力。Gabe 等(2011)用美国的经验分析了知识聚集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知识创造型人才如艺术家等聚集在一起有助于提高经济收益,但技能型人才如医生等以及低技能者聚集在一起并不能受益,因而知识聚集的正效应并不一定导致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中。传统理论常常将产业在空间上的集中现象解释为企业聚集在一起可以获得更高效益,然而 Wenting 等(2011)通过对荷兰阿姆斯特丹服装行业进行的问卷调查发现,时装设计企业在进行区位选择时,更看重的是城市舒适程度而不是其产业聚集程度,设计师主要是从全国同行高手网络中得到更大的收益。Echeverri-Carroll 等(2011)利用美国 2000 年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城市人口与工资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当地居民每增加 10 万人,则平均小时工资则会上升 0.12%;如果人口密度翻一倍,则平均小时工资要提升 2%。另外,Andersen 等(2011)通过对丹麦高度城镇化地区的案例分析,探讨了其新的城镇化模式及作用机制。吴建国等(2011)以美国两个快速发展中的大都市区——凤凰城(Phoenix)和拉斯维加斯(Las Vegas)为例,探讨了其城镇化推进过程的时空演变特征(Spatiotemporal Patterns)。吴俊杰等(2011)通过对美国加利福尼亚、华盛顿等四州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城镇化对农业经济有利有弊,但总体上说是机会多于挑战。Martínez-Zarzoso 等(2011)通过发展中国家的案例揭示出城镇化水平与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存在着一种倒“U”型关系。总起来说,西方学者对城镇化的研究要深入得多,而且重视计量分析等技术方法的应用。

4. 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

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起源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苏联,由经济地理学家巴朗斯基和经济学家科洛索夫斯基首先提出并阐明了其含义。该模式认为地域生产综合体是根据某一地区的自然、经济和经济条件,按照国民经济的当前和长远发展规划,把建立代表地区经济特点的专门化部门、与其协作配套的辅助性部门与基础设施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期取得较大的经济效益。它强调地区特点,在综合体发挥地区优势,形成合理的部门结构,既突出了专业化主导部门,又使原材料得到综合利用,该理论成为区域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开发的重要理论之一。地域生产综合体的形成是社会劳动地域分工高度发达的结果。每一个社会主义经济区都是一个地域生产综合体。随着社会分工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地域生产综合体”这一概念的内涵也在不断

地丰富。苏联和中国许多经济地理学家认为,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按地域生产综合体来规划、组织地区国民经济,或进行区域性的经济建设,具有一定的长处:(1)地域生产综合体有利于地区或企业的生产专业化和协作,充分利用社会劳动力,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2)地域生产综合体能减少中间产品过远距离的运输,缩短生产周期,节约社会劳动;(3)地域生产综合体能够把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结合起来;(4)地域生产综合体有利于安排不同年龄、性别、具有不同专长的劳动者就业,充分利用当地劳动资源;(5)地域生产综合体能共同利用基础设施,减少投资,节约用地;(6)地域生产综合体可以统一规划基本建设项目,有利于配套项目同步建成,提高投资效益。

5. “核心-边缘范式”(The center-periphery paradigm)

弗里德曼在综合许多相关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核心-边缘范式”,描述了发展中国家城镇化过程中中心与外围的空间关系。根据这一模型,城市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是以服务和管理为目的而出现的。此后由于工业化的发展,人口、资本、技术、创新以至权力都向一个或两个具有高生产力的城市集中,从而逐渐形成以最大的城市为中心区,小城镇和乡村为边缘区的二元空间结构。根据这种模式,区域发展可以看做是一种创新和现代化在区域聚落体系中自上而下、自中心向外围扩散的过程。该理论与其他类似的观点一起被称为“自上而下”的空间发展理论,是从区域空间过程的角度研究城镇化过程的重要理论框架(John Brohman, 1996)。

1.2.2 国内研究动态

我国的城镇化研究,早期都集中在大中城市的研究,农村城镇化则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被人们所关注。1984年,与乡镇企业发展相匹配的城镇化,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1998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第一次提出了“小城镇大战略”问题。2000年6月,把“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列为当前及“十五”期间必须着重研究解决的战略问题。至此,农村城镇化研究迈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国内有代表性的、影响较大的农村城镇化的观点主要有三元结构理论、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理论和“自下而上”的城镇化理论等。

1. 三元结构理论

三元结构理论最早由厉以宁等提出,后来胡必亮(1994)等也对此进行了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的繁荣发展给传统城乡二元结构带来了冲击。在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一个新的部门——农村工业部门已经从传统的农业部门中逐渐独立出

来,并初步形成了与农业部门、城市产业部门相互联系又相互分离的另一种经济力量。从而使原有的二元社会结构又发生了变化,从中衍生出三元经济结构。相应的社会结构也从传统的二元转向三元,即由农村社会阶层与城市社会阶层,转向农村、小城镇和城市社会阶层。在三元结构理论下,农业剩余劳动力可以就近进入农村工业部门和小城镇,农村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在农村就地转移到非农化产业和小城镇中去,不需要直接进入到城市中,这样,就为农村城镇化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所以三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发达地区农村城镇化发展起到了理论支持的作用。三元结构论认为:落后地区这种社会经济结构的分异并不明显,即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尚未成为区域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一元,因而不能大量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大批剩余劳动力只能涌入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增加了城市的就业负担。另一方面,由于东西部经济差异的扩大,使东部地区对劳动力有更大的吸引力,因而在人口城乡间流动的同时,也出现了人口的跨地区流动。如“孔雀东南飞”使西部大量中高层技术和管理人员流向东南沿海,而“打工潮”则使西部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涌入东部城市或城镇,据估计全国这种劳动力流动总量在6 000~7 000万人之间。人力资源流失的同时必然也伴随着资金、技术的流失,无疑都不利于西部经济的发展,不利于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发展。

2.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城镇化理论

在我国农村城镇化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农村城镇化的启动力来自何处?即农村城镇化的启动力来自于农村以外“上级”(国家、省一级)的直接投入,还是来自农村内部包括社区乃至群众的原始投入,理论界将前者称为城镇化的“自上”动力,将后者称为城镇化的“自下”动力,前者作用下的城镇化被称为“自上而下”的城镇化,后者被称为“自下而上”的城镇化。崔功豪认为,“自下而上”城镇化是指“自下”发展起来的城镇化过程,是发生在农村地域,由基层社区政府发动和农民自主推动的,以农村人口在农村内就地转移建立小城镇中心的城镇化过程,并且认为在未来一段时期内,自下而上城镇化仍是一条重要的城镇化方式。但是,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城市产业调整和外迁,今后,纯粹意义的“自下”动力为主的城镇化方式将逐步减弱,更多的是自下、自内、自外的结合,共同促进农村的城镇化过程(崔功豪,1999)。

由于历史和国情等原因,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居住分散,城镇化水平低。我国城镇化研究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已经开始了,但由于种种原因从改革开放后才加大对城镇化的研究,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加大对城镇化的研究,现阶段研

究范围主要集中在如何加快构建农村城镇、解决分散的农业人口向城镇流动、解决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目前国内已经有许多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发表的关于农村城镇化建设的专著,关于城镇化研究方面的学术论文更多,研究方向涉及了很多方面。但对具有针对性的问题研究得比较多,而对城镇化过程利用政治、经济、社会效益等全方面来系统地阐述城镇化进程的还比较少。

3. 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

城镇化滞后则是指城镇化相对滞后于经济发展或工业化、非农化水平,一般常用世界各国的城镇化率与人均 GNP 对应关系的国际经验进行参照比较。王小鲁、夏小林利用世界银行数据进行计算分析,认为我国城市化水平比同等人均 GNP 国家平均水平约低 12 个百分点,如果按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则低 21 个百分点(王小鲁,夏小林,1999)。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虽然步伐加快,但却出现了明显滞后经济发展水平的新情况,而且滞后程度也在不断拉大。朱宝树认为现阶段我国人口城镇化的滞后基本上是现实城市容量不足性的滞后。加快城市化既要积极又要稳妥,必须要在有效扩增城市容量的基础上提高人口城市化率。关于我国城市化滞后的原因,夏小林、王小鲁、温铁军、叶裕民等都对此进行了研究,温铁军指出:中国城镇化滞后的根本原因是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形成的结构偏差及其派生的“资本排斥劳动”。

4. 城镇化研究的热点问题

城镇化研究的热点问题及主要理论观点和方法如下所述。

(1) 民生问题成为焦点。2011 年学术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民生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推出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第 4 号),专门针对民生问题作了系统而深入的探讨,提出了改善民生的综合措施,并指出民生型城镇化将是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大方向。在众多学者的研究视野中,城镇居民的住房及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成为关注的重点。崔晓娟(2011)对我国城镇化过程中保障性住房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要建立完整的保障房计划体系,完善其建设运营中的各项立法,并建议成立专门的保障房建设中介金融机构。杨嘉莹根据北京市丰台区草桥村失地农民“土地换保障”的成功经验,提出“逢征必保”的原则。陈卫波等(2011)指出,要想解决失地农民的保障问题,还必须着手构建补偿、就业和社会保障“三位一体”的保障体系。许多学者还对城市中农民工住房问题及“蚁族”生存状况进行了调研。

(2) 城乡收入差距成为热点。针对当前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

大的现实,许多学者进行了实证研究及理论探讨。王子敏(2011)利用省级统计资料计算分析了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城镇化进程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就会拉大0.39个百分点。同时发现,城乡收入差距在空间上也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性。邱福林(2011)和符翔云(2011)分别就广东和浙江两省城乡收入差距与城镇化进程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也表明,城乡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呈正相关。董敏和郭飞(2011)的研究发现,城镇化进程中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倒U型”趋势,而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在于城市偏向政策及不合理的农地征用规则。曾江辉(2011)的研究也发现这种“倒U型”趋势,并指出当前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已达临界点。王宏利(2011)认为,是投资与出口导向的重工业化政策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着力点则在于提高劳动力价格。周高宾指出,城乡收入差距反过来又成为影响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因素: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城镇化进程则以单纯的人口迁移和农民工进城的方式展开,表现为简单的城镇化过程。

(3)“被城镇化”成为一个时兴的话题。在当前我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其主导性力量是政府自上而下的制度性安排与资本扩张相结合,而广大民众则大多处于被动地位。尤其是农民和农民工,其地位更加被动。这一问题已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开始反思我国的城镇化模式。王美琴(2011)对失地农民被动城镇化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王道勇(2011)则对流动人口的“被农民化”现象给予了高度关注。白永秀和王颂吉(2011)指出,城镇化要经历“被动城镇化”和“主动城镇化”两个阶段,而我国当前正处于由前一阶段向后一阶段转变的过程中。

(4)“半城镇化”成为重要主题。“半城镇化”或者说“虚假城镇化”“浅层城镇化”“不完全城镇化”“不充分城镇化”“非正规城镇化”等,都是对当前我国城镇化复杂状况的一种描述。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指出,我国的城镇化率是被严重高估的,目前统计的6亿城镇人口中,至少有2亿人并没有享受到市民的权利。吴华安和杨云彦(2011)指出,虽然农民工“半城镇化”现象是普遍的和长期的,但总体上已呈趋弱之势。李强(2011)近年来曾组织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师生对广州外来农民工的“不融入”及“农转非”人员的“半融入”问题开展过深入的调研。王道勇(2011)将近年来出现的“民工荒”现象与“浅层城镇化”联系在一起,建议将农民工问题纳入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并在财政体制上实行“费随人走”的办法,以便将农民工纳入常住地公共预算。余颖慧针对农民工“半城镇化”问题就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路径进行了探讨。